

# 南朝弥勒造像与傅大士弥勒化身

李裕群

关键词：弥勒造像 傅大士 南朝

KEYWORDS: Maitreya Statues Fu Daishi (497-569 AD) Southern Dynasties

ABSTRACT: In the 5th and 6th centuries, the belief of the descent of Maitreya was very popular in the Jiangnan area, the Longhua Temple worshipping the statue of Maitreya as Buddha was flourishing and the Longhuahui (Maitreya's preach assembly under the dragon-flower tree, aka Sri Lankan ironwood) was also once prospering. The Maitreya figures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in the Jiangnan area are seen in the cliff niches at Baoxiang Temple in Xinchang County, Zhejiang and the Qixia Mountain Grottoes in Nanjing, Jiangsu; in Sichuan area, the Maitreya figures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are seen on the votive stele made by Monk Xuansong in Maoxian County and the Maitreya statue made by Monk Fahai at Xi'an Road in Chengdu. Fu Daishi (497-569 AD), a devout lay Buddhist native to Dongyang District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announced himself as the incarnation of Maitreya to attract believers, and invented the *zhuanlun jingzang* (rotating Buddhist scripture library).

## 一

公元5、6世纪，江南地区弥勒下生信仰盛行，京师建康（今江苏南京市）<sup>[1]</sup>、会稽（今浙江绍兴市）、荆州等地皆出现供奉弥勒下生像而得名的龙华寺<sup>[2]</sup>。与之相应，龙华会亦风靡于时。僧祐著《出三藏记集》就录有周顛撰《宋明皇帝初造龙华誓愿文》、《京师诸邑造弥勒像三会记》、《齐竟陵文宣王龙华会记》<sup>[3]</sup>，表明龙华会得到了南朝统治者的推崇，并在民间流行开来。此事或与东晋的法显有关。酈道元《水经注》卷二十五《泗水》条载：彭城“泗水西有龙华寺，是沙门释法显远出西域，浮海东还，持龙华图，首创此制，法流中夏，自法显始也。其所持天竺二石，仍在南陆东基堪中，其石尚光洁可爱”<sup>[4]</sup>。所谓龙华图，应指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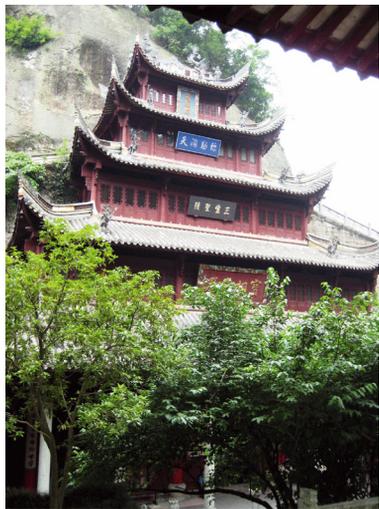
弥勒于龙华园华林树下成道三会众生之像。按法显于公元399年从陆路西行求法，公元412年由海路返回，经青州到达建康<sup>[5]</sup>，其首创龙华图应在抵达京师以后。嗣后，雕造弥勒佛像便成为流行风尚。东晋戴逵之子戴颛曾为济阳江夷造弥勒像，“触手成妙，初不稽思，光颜圆满，……此像旧在会稽龙华寺”<sup>[6]</sup>，戴颛所制亦应是弥勒成佛之像。南朝造弥勒像事文献记载颇多<sup>[7]</sup>，保存下来的实物却十分少见。在江南仅有见于浙江新昌宝相寺摩崖龕像和江苏南京栖霞山石窟的两处实例<sup>[8]</sup>，四川地区出土的南朝造像则有较多实例，可以作为江南弥勒信仰的补充资料。

## 二

宝相寺，即剡溪石城山遗迹，初名隐岳寺，后改称石城寺，位于今新昌县西南南明

作者：李裕群，北京市，1007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山。寺院依山而建，内有五层木构高阁连接山崖龕像（图一）。龕平面作横椭圆形，敞口露顶式。龕内雕大型佛像一躯，像高13.23、佛座高2.4米，为现存南朝第一大佛。佛像屡经后世妆奩，原状已改变，现存佛像双手施禅定印，结跏趺坐式（图二）。梁代刘勰撰《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载齐永明四年（公元486年）僧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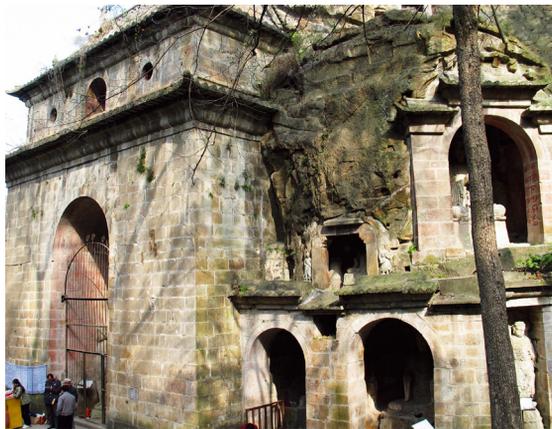
图一 宝相寺弥勒阁



图二 宝相寺弥勒大佛

游观石城隐岳寺，见寺北青壁高达数十丈，显现如佛光之形，于是发愿造弥勒像，“敬拟千尺，故坐形十丈”<sup>[9]</sup>。齐建武年间（公元494~497年）开始兴工雕造，不久僧护病故。梁天监七年（公元508年）僧祐律师受敕重新经营<sup>[10]</sup>，天监十二年（公元513年）续凿工程开始，十五年（公元516年）竣工。

“像身坐高五丈，若立形足至顶十丈，圆光四丈，座轮一丈五尺，从地随龕光焰通高十丈”<sup>[11]</sup>。《高僧传》亦载：“释僧护，本会稽剡人也。……后居石城山隐岳寺，寺北有青壁，直上数十余丈，当中央有如佛焰光之形，……于是擎炉发誓，愿博山镌造十丈石佛，以敬拟弥勒千尺之容，使凡厥有缘，同睹三会。以齐建武中，招结道俗，初就雕剪，疏凿移年，仅成面朴。顷之，护遘疾而亡。……后有沙门僧淑纂袭遗功，而资力莫由，未获成遂。至梁天监六年（公元507年）……敕遣僧祐律师专任像事。……初僧护所创凿龕过浅，乃铲入五丈。更施顶髻，及身相克成，莹磨将毕，夜中忽当万字处，色赤而隆起。今像胸万字处，犹不施金缚，而赤色在焉。像以天监十二年春就功，至十五年春竟。坐躯高五丈，立形十丈。龕前架三层台。又造门阁殿堂，并立众基业，以



图三 栖霞山无量殿及左侧诸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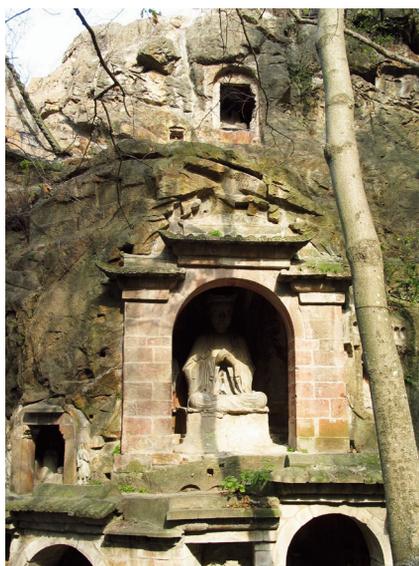
充供养。其四远士庶，并提挾香华，万里来集，供施往还，轨迹填委”<sup>[12]</sup>。

由此可知，僧祐经营大佛，“事虽仍旧，功实创新”。宿白先生根据《刘勰碑》和《僧护传》所记，推断大佛原为倚坐弥勒，发作螺髻，右手施无畏印，是弥勒龙华树下成佛，广度众生，共成佛道的形象<sup>[13]</sup>。

栖霞山石窟位于南京城东北约22公里，为六朝名寺栖霞寺所在。南朝龕像集中于寺院东南的千佛岩区，窟群以无量殿（第19窟）为中心（图三），现存有编号的洞窟29座<sup>[14]</sup>（图四）。据研究，南朝齐、梁时期开凿的洞窟有16座，其中，南齐洞窟8座（第18~20、22~24、26、27窟），梁代洞窟8



图四 栖霞山千佛岩区立面示意图  
(据张雯：《成都地区南朝石造像与南京栖霞山南朝窟龕的分期与比较》图23)



图五 栖霞山第23窟



图六 栖霞山第15窟

为倚坐姿弥勒下生像。该窟是齐文惠太子、豫章王、竟陵王等皇室成员和官员赞助开凿的洞窟之一，约雕造于齐永明二年（公元484年）至建武四年（公元497年）或永元二年（公元500年）间。

梁代开凿的第5、10、12、13、15窟皆以倚坐姿弥勒佛为主尊，数量占

座（第5、10、12、13、15、21、25、28窟）<sup>[1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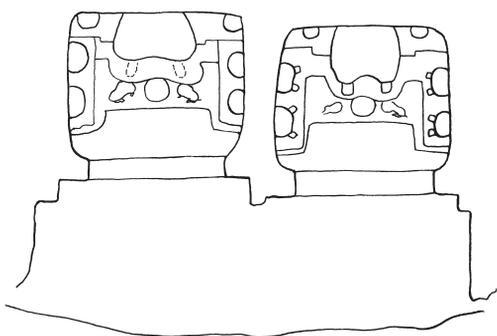
南朝龕像屡经后世妆奁修补，特别是民国年间造像被覆以水泥，面目全非。南齐弥勒龕仅第23窟一例，位于无量殿左侧上层洞窟中心，平面呈横椭圆形，穹隆顶。正壁有舟形大背光，壁前设通壁坛，上置高座。座上造像已非原貌（图五），但根据佛座前尚存的半圆形莲台残迹，莲台前原设一炉，而只有倚坐姿的佛像才在座前设莲台。同时，发掘出土的南朝陈“江总碑”残石背面铭文记载，无量寿佛大像（第19窟）开凿之后，“弥勒下生龕”等也陆续开凿<sup>[16]</sup>，符合弥勒像条件的唯此一窟，故第23窟主尊原应

梁代洞窟的一半以上，表明当时都城地区弥勒下生信仰极为流行。5座洞窟平面均略呈圆角方形，平顶。窟内坛上雕一铺七身像，正壁倚坐弥勒佛及二弟子，侧壁为二菩萨和二力士（图六）。其中第12、13窟为一组双窟，共用一个前厅，佛座前有博山炉和二狮子（图七）。第12窟主尊弥勒后人改为结跏趺坐式，但座前残留下垂双足的痕迹，可以判定原像为倚坐姿（图八）。

宝相寺和栖霞山的弥勒下生像原来均为倚坐姿。这种坐姿并不见于弥勒经典。倚坐作为弥勒特有的坐姿始于何时，是否与法显“持龙华图，首创此制”有关，目前还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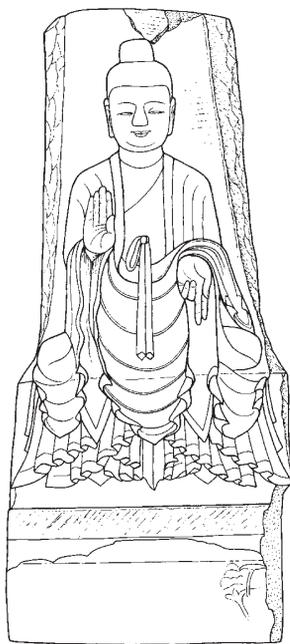
图七 栖霞山第12、13窟



图八 栖霞山第12、13窟平面示意图



图九 齐永明元年弥勒造像碑  
(引自《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图67-1)



图一〇 齐永明元年弥勒造像碑  
(引自《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图64-1)

好确定。不过据宝唱《名僧传》所记，刘宋龙华寺道矫“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罄率衣资，开诱闻业，与建康民朱舛孙共起佛殿三间，并诸花幡，造夹苮弥勒佛倚像一躯，高一丈六尺，神仪端严，开发信悟”<sup>[17]</sup>。可知，约在公元5世纪前半叶，江南地区已有倚坐姿弥勒佛。

江南地区的南朝弥勒造像已失原貌，但以益州（今成都）为中心的四川地区是南朝长江上游的政治、文化和佛教中心，受江南弥勒信仰的影响，弥勒像亦颇为流行。四川地区已出土数批佛教石造像<sup>[18]</sup>，其中，南朝造像中明确为发愿造弥勒像的有茂县出土的齐永明元年（公元483年）比丘玄嵩造像碑、成都西安路出土的齐永明八年（公元490年）比丘法海造像<sup>[19]</sup>。

玄嵩造像碑正面雕弥勒佛坐像，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右手上举，施无畏印，左手下垂，食指和中指下指，余指弯屈（图九；图一〇），背面为无量寿佛<sup>[20]</sup>。侧面镌刻发愿文曰：“齐永明元年岁次癸亥七月十五日，西凉曹比丘释玄嵩为帝主臣王、累世师长、父母兄弟、六亲眷属及一切众生敬造无量寿佛、当来弥勒成佛二世尊，愿一切群生发弘愿心，明信三宝，瞿修十善，遭遇慈氏龙华三会，聂豫其昌，永去尘结，法身满足，广度一切，共成佛道……”。

比丘法海造像为背屏式<sup>[21]</sup>，正面雕一尊弥勒佛坐像及二胁侍菩萨像（图一一；图一二）。弥勒佛身

比丘法海造像为背屏式<sup>[21]</sup>，正面雕一尊弥勒佛坐像及二胁侍菩萨像（图一一；图一二）。弥勒佛身



图一— 齐永明八年弥勒造像  
正面  
(引自《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图  
54-1)



图一二 齐永明八年弥勒  
造像正面  
(引自《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  
图52)



图一三 齐永明八年弥勒造像  
背面  
(引自《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图  
54-2)



图一四 齐永明八年弥勒造像背面拓本  
(引自《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图5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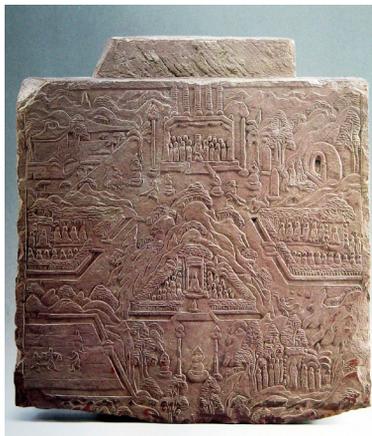
着褒衣博带式袈裟，手印与玄嵩造像碑完全相同，结跏趺坐于束腰须弥座上，座两侧有二狮子护法。背面雕屋形龕，龕内雕弥勒菩萨，手残，交脚坐于宝盖下（图一三；图一四）。背面铭文为：“齐永明八年庚午岁十二月十九日，比丘法海与母为亡父造弥勒成佛石像一躯，愿现在眷属七世父母，龙华三会，希登初首，一切众生普同斯福”。发愿文明确正面主尊为弥勒成佛像。背面的交脚弥勒菩萨在南朝造像中十分罕见，但北朝甚为流行，是弥勒菩萨特有的坐姿，屋形龕则象征弥勒所居的兜率天宫<sup>[22]</sup>。因此，该造像的主题是表现弥勒上下

生，主尊弥勒成佛像以及发愿文则说明弥勒下生信仰被突出强调。

四川地区南齐弥勒佛与江南不同，均为结跏坐姿，尚未形成固定的倚坐式。弥勒上下生的题材延续到萧梁时期，受江南影响亦出现倚坐姿的弥勒佛。值得注意的是，成都万佛寺出土的一通梁代造像碑上部正面仅存一圆形宝盖，宝盖之上雕刻须弥山形，山腰蛟龙盘绕，山上有建筑和人物等（图一五）。背面为浅浮雕图像，画面正中上方为一屋形龕，象征着弥勒兜率天宫，屋内雕交脚弥勒菩萨像及听法僧众。画面左右及正前方各雕一佛，结跏趺坐于树下的宝帐之下，周围有听法僧众环绕，此画面正表现了弥勒下生龙华树下三会众生的形象<sup>[23]</sup>（图一六），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龙华三会图像。因此，背面浅浮雕表现的是弥勒上下生。据此，宝盖下原有的主尊可推定为弥勒佛。四川省博物院藏有一通梁代造像碑的上半部，上有螭首，碑首中心雕上下二龕，上龕雕倚坐弥勒佛，下龕雕交脚弥勒菩萨，残存的碑身为千佛，中心有一龕，像残（图一七）。此亦表现了弥勒上下生。汶川出土的一件梁代背屏式造像正面雕三尊佛（图



图一五 万佛寺梁代造像碑上部正面  
(引自东京国立博物馆、朝日新闻社:《中国国宝展》图20,朝日新闻社,2000年)



图一六 万佛寺梁代造像碑上部背面  
(引自东京国立博物馆、朝日新闻社:《中国国宝展》图20,朝日新闻社,2000年)



图一七 四川博物院藏梁代造像碑首



图一八 汶川出土梁代佛三尊像



图一九 汶川出土梁代佛三尊像  
(引自《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图68-1)

一八;图一九),形体、大小一致,正中为结跏趺坐佛,两侧为倚坐佛,可能是释迦和双弥勒佛组合<sup>[24]</sup>。成都出土的南朝造像还有齐建武二年释法明造观世音成佛像而祈愿龙华三会<sup>[25]</sup>。

以上诸例可以说明,南朝齐梁时期,弥勒上下生的信仰在四川地区比较流行。虽然出现了弥勒上生图像,但发愿文中表述的“遭遇慈氏龙华三会,广度一切,……共成佛道”、“龙华三会,希登初首”之愿望,以及龙华三会图像的出现,表明南朝弥勒净土更加重视弥勒下生信仰。弥勒是未来佛,继释迦之后降到

人间,教化众生。因此,弥勒信仰的流行反映了民众期盼弥勒下生、拯救众生的诉求。

### 三

南方流行弥勒信仰,自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南朝东阳傅大士以弥勒化身的面貌出现,显然与这样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其生平见于《东阳双林傅大士碑》、《辩正论》、《续高僧传》、《善慧大士录》、《佛祖统纪》等诸多文献,

已有学者作了详细考证和论述<sup>[26]</sup>,此不赘述。

傅大士以一生补处的弥勒自居。《东阳双林傅大士碑》载:“东阳郡乌伤县双林寺傅大士者,即其县人也。……自叙元系,则云:补处菩萨。仰嗣释迦法王真子,是号弥勒。虽三会济济,华林之道未孚;千尺岩岩,穰佉之化犹远。但分身世界,济度群生。机有殊源,应无恒质。自叙因缘,弥勒菩萨亦有五百身在阎浮提,种种示现,利益众生”<sup>[27]</sup>。《善慧大士录·序》载:“双林大士自云是弥勒应身”<sup>[28]</sup>。所谓应身,即佛为教化众生,应众生之根机而变化显现之

身。起初，傅大士传法并不顺利。《东阳双林傅大士碑》载：“太守王佺言其诡诈，乃使邦佐，幽诸后曹。迄至兼旬，曾无段食。于是州乡媿伏，远迹归依。逃迹山林，肆行兰若”。志磐《佛祖统纪》卷二十二亦记：东阳大士傅翕“成道之日，当代释迦坐道场。已而四众，沓至作礼。郡守王佺谓是妖妄囚之。兼旬不食，媿而释之。还山愈精进，曰：‘我从兜率宫来，为说无上菩提，昔隐此事，今不覆藏’”<sup>[29]</sup>。经历了牢狱之灾后，傅大士公开以弥勒从兜率宫下生说法的面貌出现，广延信徒。《善慧大士录》卷一载：“大士还山，愈加精进，远近愿师事者日众。……（弟子）慧集处处教化，常言大士是弥勒应身。大士凡讲说及作功德，请佛停光，两眼常出金色光明。告大众曰：‘学道若不值无生师，终不得道。我是现前得无生人，昔隐此事，今不覆藏，以示汝等’。又弟子礼拜，大士因谓之曰：‘汝莫礼我，但礼殿中佛，即我形像’”。傅大士明确表示殿中佛像即是他的形像，也就是弥勒下生的形象。所以《佛祖统纪》卷二十二又载：“弟子慧荣欲建龙华会。大士曰：‘龙华是我事，汝可建请佛停光会，若从吾言定见龙华’”。

那么，傅大士的形象怎样呢？《东阳双林傅大士碑》载：“其外人所见者，拳握之内，或吐异香。胸臆之间，乍表金色。……忽见大士身长丈余。……或见脚长二尺，指长五寸余。两眼光明，双瞳照耀，皆为金色”。法琳《辩正论》卷三亦记：“梁东阳郡乌伤县双林寺傅大士，常转法轮，绍隆尊位。分身世界，济度群生。或胸臆之间，乍表金色。拳握之内，时吐异香。或现身身长丈余，臂过于膝，脚长二尺，指长五寸。两目分明，双瞳照耀。颜貌端严，有大人之相”<sup>[30]</sup>。“现身身长丈余”当为虚构，而“胸臆之间，乍表金色”，即当胸处显现金色，则是完全可以用其他手段来实现。这使我们

联想到剡溪石城山弥勒大像，前引《高僧传》卷十三《僧护法》载：“夜中忽当万字处，色赤而隆起。今像胸万字处，犹不施金缚，而赤色在焉”。如此瑞迹与傅大士“胸臆之间，乍表金色”何其相似也。剡县为汉代旧县，六朝因之，属会稽郡。东晋以来，剡山即为浙东佛教繁盛之地，高僧隐居此山修行者甚多。著名者如梁国师草堂寺智者慧约，《续高僧传》卷六《慧约传》载：“释慧约，字德素，姓娄，东阳乌场人也。……七岁便求入学，即诵孝经论语。……剡中佛事甚盛。……至年十二始游于剡，遍礼塔庙，肆意山川。……宋泰始四年（公元468年），于上虞东山寺辞亲翦落，时年十七。事南林寺沙门慧静。……又随静住剡之梵居寺。服勤就养，年踰一纪。……齐竟陵王作镇禹穴，闻约风德雅相叹属。……齐中书郎汝南周顒为剡令，钦服道素，侧席加礼。……且约孝通冥感，思归遄返。而二亲丧亡，并及临诀。孺慕婴号，不交人世。积时停乡，以开慈道。后还都又住草堂。……天监十一年（公元512年）始敕引见。……至十八年（公元519年）己亥四月八日，天子发弘誓心，受菩萨戒，乃幸等觉殿，降雕玉辇，屈万乘之尊。……大同元年（公元535年）八月……便入涅槃，春秋八十有四”<sup>[31]</sup>。东阳乌场人慧约仰慕“剡中佛事甚盛”，“遍礼塔庙”后出家，可知剡山佛事在南朝影响很大。前述由僧祐律师受敕重新经营完工于公元516年的石城隐岳寺弥勒大像是轰动于时的大事，当为世人所熟知。入隋以来，石城弥勒大像仍影响巨大，受人敬仰。如《续高僧传》卷十七《智颢传》记载：隋国师天台国清寺智颢“命学士智越，往石城寺扫洒，‘吾于彼佛前命终。施床东壁，面向西方，称阿弥陀佛、波若、观音’。又遣多然香火，索三衣钵杖，以近身自余道具，分为二分，一奉弥勒，一拟羯磨”<sup>[32]</sup>。隋代沙门灌顶纂《国清

百录》卷三著录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晋王杨广《王答遗旨文》载:“鄆境灵塔、吴内石像、剡县弥勒、尊匠卧疾之处,并使装饰”<sup>[33]</sup>。因此,傅大士很可能利用石城弥勒大像的灵异效应证明其为弥勒应身,吸引广大信众。同时,傅大士在双林寺首创转轮经藏,作为传法和扩大影响的手段。《佛祖统纪》卷三十三载:“梁傅大士愍世人多,故不暇诵经及不识字,乃于双林道场创转轮经藏,以奉经卷。其誓有曰:‘有三登吾藏门者,生生不失人身。有能信心推之一匝,则与诵经其功正等。有能旋转不计数者,所获功德即与读诵一大藏经正等无异’。藏前相承列大士像,备儒道释冠服之相者,以大士常作此状也(佛印为王荆公赞其像曰:‘道冠儒履释袈裟,和会三家作一家,忘却率陀天上路,双林痴坐待龙华’)”<sup>[34]</sup>。此事影响深远,后世在佛寺和石窟中置转轮经藏即源于此,值得注意。

### 注 释

- [1] a.[梁]慧皎著,汤用彤校注:《高僧传·慧进传附僧念传》第468页:“时京师龙华寺复有释僧念,诵《法华》、《金光明》,蔬食避世”,中华书局,1992年。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b.《神僧传》卷三载:“释昙超,姓张氏,清河人……初止都龙华寺,元嘉末南游始兴”,《大正藏》卷50第968页。
- [2] [唐]道世著,周叔迦等点校:《法苑珠林·法服篇》第1107页:“宋沙门僧妙者,上党人也。家姓冯氏,居于江陵上明村。妙至大明年初,游乞零陵,因居郡治龙华精舍……大明八年(公元464年)卒龙华寺”,中华书局,2003年。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 [3] [梁]僧祐撰,苏晋仁、萧鍊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卷十三,中华书局,1995年。
- [4] 王国维:《水经注校》第8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梁]宝唱所撰《名僧传·宝云传》载:“隆安元年(公元397年),乃辞入西域,誓欲眼都神迹,躬行忏悔。遂游于阗,及天竺诸国。与智严、法显发轫,是同游造各异。于陀历国,见金薄弥勒成佛像,整高八丈”(转引自宗性:《名僧传抄·宝云传》,见《卍新纂续藏经》卷77第358页。《名僧传》原书三十卷,已佚,现抄本为日本笠置寺僧宗性于文历二年即1235年从原书中抄录的部分内容)。但《法显传》明确记载陀历国为八丈木雕弥勒菩萨像,而非弥勒成佛像,参见[晋]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第2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 [5] a.《高僧传》卷三《法显传》第87~90页。  
b. [晋]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 [6] 《法苑珠林·敬佛篇》“弥勒部”第543、544页:“(戴)逵第二子颙,字仲若……既负荷幽贞,亦继志才巧。逵每制像,常共参虑。济阳江夷少与颙友,夷尝托颙造观世音像。致力罄思,欲令尽美,而相好不圆,积年无成。后梦有人告之曰:江夷于观世音无缘,可改为弥勒菩萨。戴即停手,驰书报江。信未及发,而江书已至,俱于此夕感梦,语事符同。戴喜于神应,即改为弥勒。于是触手成妙,初不稽思。光颜圆满,俄尔而成。有识赞仰,咸悟因缘之匪差。此像旧在会稽龙华寺”。
- [7] 宿白:《南朝龕像遗迹初探》,见《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
- [8] 同[7]。
- [9] 碑文著录于[宋]孔延子:《会稽掇英总集》卷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0] 《高僧传·僧祐传》第440页:“祐为性巧思,能目准心计,及匠人依标尺寸不爽。故光宅摄山大像、剡县石佛等,并请祐给始准画仪则”。
- [11] 同[9]。
- [12] 《高僧传》卷十三《僧护法》第490~492页。
- [13] 同[7]。
- [14] 张雯:《成都地区南朝石造像与南京栖霞山南朝窟龕的分期与比较》图23、24,见《石窟寺研究》第二辑,文物出版社,2011年。
- [15] a.魏正瑾、白宁:《南京栖霞山南朝石窟考古概要》,见《石窟寺研究》第二辑,文物出版社,2011年。  
b.林蔚:《栖霞山千佛岩区南朝石窟的分期研究》,见《燕京学报》新十九期。该文将

第9、16、17窟也归入梁代窟龕。

[16] 同[15] a。

[17] 宗性：《名僧传抄》第二十七《道矫传》，见《卍新纂续藏经》卷77第359页。

[18] 历年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见四川博物院等：《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中华书局，2013年。

[19] 董华峰：《四川出土的南朝弥勒造像及相关问题研究》，《敦煌学辑刊》2011年第2期。该文特别提到武陵王萧纪造像铭曰：“梁大同七年太岁辛酉乙未朔十三日庚辰，武陵王萧纪为亡父母敬造弥勒一躯，供养兴国寺。上为皇帝陛下，国土康宁，兵灾永息。为愿七世父母垂出六尘，道生佛国，早登净境。现在眷属常与善居，一切众生咸同斯福”。此造像铭最早著录于高文、高成刚编《四川历代碑刻》（第87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笔者早已注意到该铭刻存在问题，按梁武陵王萧纪为武帝第八子。按《南史·梁武帝诸子传》所载，天监十三年封武陵王，大同三年（公元537年）为都督、益州刺史，在蜀十七年。但梁大同七年（公元541年），梁武帝（464~549年）还在世，何以称“为亡父母敬造弥勒一躯”，又有“上为皇帝陛下”这样矛盾的祈愿。干支纪年也有问题，梁大同七年没有乙未朔。显然萧纪造像铭系伪刻，不宜作为论述川地弥勒信仰的论据。

[20] 刘志远、刘廷璧：《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图1、2，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该造像碑为1921年发现，现藏于四川省博物院。

[21]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西安路南朝石刻造像清理简报》，《文物》1998年第11期。

[22] [唐]道宣：《广弘明集》卷二十七（《大正藏》卷52第319页）录有齐竟陵王肖子良《净住子净行法门奉养僧田门》，曰：“奉为至尊皇后皇太子七庙圣灵天龙八部乃至十方一切剧苦众生敬礼十方一切僧宝，敬礼当来下生佛兜率天弥勒菩萨僧”。此亦强调弥勒下生。到目前为止，交脚弥勒菩萨题材在江南地区尚未见到实例。北朝弥勒信仰与南朝差异显著，更强调弥勒上生，流行交脚弥勒菩萨，旨在表现弥勒菩萨在兜率天宫敷演众释

的形象，故北魏云冈、龙门石窟中弥勒菩萨比比皆是。因此，四川地区发现的交脚弥勒菩萨图像也可能源于北朝。

[23] a.赵声良：《成都南朝浮雕弥勒经变与法华经变考论》，《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该文认为背面浮雕有弥勒说法和弥勒三会，还有翘头末城、龙王罗刹扫除、农作耕获和迦叶禅窟情节，与鸠摩罗什所译《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和《佛说弥勒大成佛经》相合。

b.李晓宇：《四川南朝弥勒信仰与弥勒造像》，《宗教学研究》2013年第2期。该文认为正面宝盖上的须弥山应为鸠摩罗什所译《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记载的耆闍崛山，“尔时弥勒佛欲往长老大迦叶所，即与四众俱就耆闍崛山，于山顶上见大迦叶”。

[24] 雷玉华等：《四川汶川出土的南朝佛教石造像》，《文物》2007年第6期。

[25] 此造像铭为：“齐建武二年岁次乙亥荆州道人释法明奉为七世父母师徒善友，敬造观世音成佛像一躯，愿生生之处永离三涂八难之苦，面睹诸佛弥勒三会，愿同初首，有识群生，咸珍斯誓，发果菩提，广度□切”。参见张肖马、雷玉华：《成都商业街南朝石刻造像》，《文物》2001年第10期。

[26] 张子开：《傅大士研究》（修订增补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关于傅大士以弥勒应身示现，可参阅该书第九章。

[27] [陈]徐陵：《东阳双林傅大士碑》，转引自《善慧大士录》卷三，见《卍新纂续藏经》卷69第121~123页。

[28] 《卍新纂续藏经》卷69第104页。

[29] 《大正藏》卷49第244页。

[30] 《大正藏》卷52第506页。

[31] [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第182~186页，中华书局，2014年。

[32] [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第632页，中华书局，2014年。

[33] 《大正藏》卷46第810页。“尊仪卧疾之处”即指《续高僧传》卷十七《智颢传》所记智颢“卒于天台山石像前”，大石像即刻县石城寺弥勒大像。

[34] 《大正藏》卷49第318页。

（责任编辑 付兵兵）

## 本期要览

**湖北随州市周家寨墓地M8发掘简报** 2014年发掘的湖北随州市周家寨墓地M8为竖穴土坑墓，葬具为一椁一棺。出土器物以漆木竹器为主，有扁壶、耳杯、奩、俑、璧、梯形器、“T”形器、六博盘、竹筒等。推测墓主是西汉武帝时期的下层官吏。竹筒内的木牍墨书《告地书》，出土的数百枚简牍写有《日书》，对研究秦汉时期《日书》和古代择日体系意义重大。

**辽宁长海县门后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2012年，对辽宁长海县门后贝丘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方形浅地穴房址和野外灶址，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蚌器和动物骨骼。根据陶器以手制筒形器为主、纹饰多为“之”字纹等特征，门后遗址可归为小珠山文化第一期早期阶段。遗址未见农作物遗存，生计方式可能以渔猎为主，测年数据为公元前4345~3965年。

**甘肃漳县墩坪墓地2014年发掘简报** 201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所发掘了漳县墩坪墓地的27座墓葬。墓葬形制有竖穴土坑墓和竖穴土坑偏室墓两类，部分有二层台，葬式为仰身直肢葬，填土中有殉牲。出土遗物有铜器、铁器、金器、骨器、木器、陶器及串饰等，铜器有车马饰、兵器、工具等。根据随葬品和葬俗特征，这批墓葬应是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的西戎文化遗存。

**试析王湾三期文化的来源** 王湾三期文化早期遗存主要分布于河南中部的颍河中上游。龙山时代前期，这里是庙底沟二期文化谷水河类型、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和屈家岭文化的交汇地带。分析出土陶器的形制特征，可知王湾三期文化的来源以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因素为主，吸收了少量庙底沟二期文化谷水河类型、屈家岭文化及山东龙山文化的因素。

**南朝弥勒造像与傅大士弥勒化身** 公元5、6世纪，江南地区弥勒下生信仰盛行，供奉弥勒下生像的龙华寺兴起，龙华会亦风靡一时。现存南朝时期的弥勒造像在江南地区见于浙江新昌宝相寺摩崖龕像和江苏南京栖霞山石窟，四川地区有茂县比丘玄嵩造像碑和成都西安路比丘法海造像。南朝东阳傅大士曾以弥勒应身现世，吸引信众，并首创转轮经藏。